

憶「吳老頭子」稚暉師

謝 康

悠悠宇宙，將無窮極。
願吾朋友，勿草草人生。

這幾句話，是吳稚老（敬恆）的宇宙觀和人生觀的結論。吳先生生於江蘇武進，長於國父一歲，幼時名叫「吳眺」，因為他景慕六朝詩人謝眺，字玄暉。李白也是很佩服謝眺的，有詩為證：「解道澄江靜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吳先生既與謝眺同名，別字就叫做「稚暉」了。當他在一八九一年（光緒十七年辛卯科）考中舉人和後來在南菁書院，都是用吳眺這個名字。其後他到英國，寫「拙庵客座談話」時所用的拙字，仍然和眺字有關。他雖改名「敬恆」，但稚暉這個別號，更為通行，大家都稱他為吳稚老，台北敦化路和強恕中學都豎立有他的銅像。

我認識吳稚老，並拜他為師，是民國十年春初的事，那時他五十七歲，我二十歲，算來已經半個世紀有多了。

這時候，中國的局勢，分南北分東西，實在緊張和混亂得很。北方是徐世昌、曹錕、張作

霖在那裏袍笏登場，變戲法；湖南是趙恆惕搞他的「聯省自治」；四川的楊森、劉湘、劉文輝等分別割據地盤。中原則由吳佩孚坐鎮洛陽，遙控武漢。正是聲名顯耀，八方風雨會中州，十分得意。南方則陳炯明部粵軍於九年中秋後回粵垣，驅逐桂軍陸榮廷幹部莫榮新回廣西，號稱「打右有怕」，（廣西梧州人說「右有怕」，就是不怕的意思，廣東人因不滿意桂軍多年駐粵，乃以「打右有怕」作為驅逐廣西軍隊的有力口號！）由於這句口號的魔力，有些手無寸鐵的留粵桂籍學生，也被認為該挨揍的對象。因為感情一經刺激和衝動，羣衆也就會變成盲目的了；於今事隔五十餘年，回想起來，猶有餘悸。筆者那時初到廣州，剛考入國立廣東師範學校文史部不久，也因此逃難到香港，險些挨揍一頓，那時因西江有戰事，兩粵交通斷絕，香港生活昂貴，不能久住，又再逃到粵北韶關，托庇於友人家裏。等候戰事結束，時局安靖，坐粵漢路火車，回校上課，那時學校因戰事停課，將近兩個月了。

民十這一年，國父在廣州就任大總統職，並成立大元帥府，準備北伐。出師桂林，派馬君

武為廣西省長，陳炯明的軍隊，打入廣西之後，事實上他已成為兩廣最有實力的人物。他一面勾結北洋軍閥，一面贊成趙恆惕的聯省自治，阻撓國父的北伐，（不供應軍餉）同時還聯絡中共頭目陳獨秀，請他做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叫左傾分子陳公博辦「羣報」宣傳社會主義；陳獨秀並推荐譚平山、韋懇等為廣東高師學校教授，暗中進行赤化廣東教育界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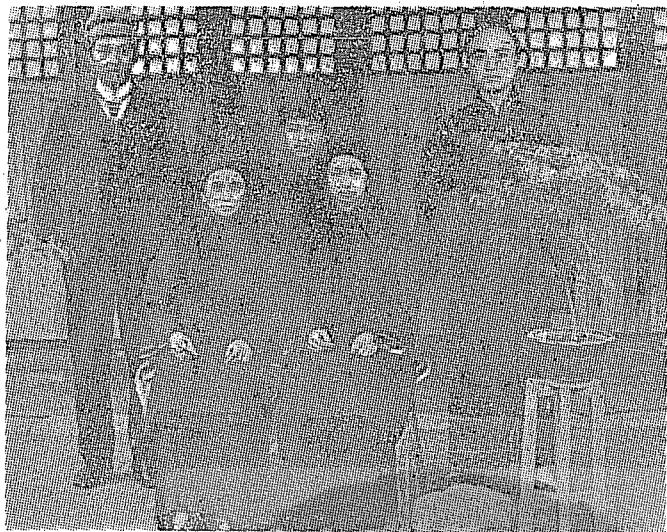
籌辦廣東大學堂

民國九年年底，稚暉先生因留法勤工儉學及國語統一運動事抵達廣州，下榻廣東教育委員會裏面，受陳炯明和陳獨秀的招待。教育委員會的地位，相當於省政府的教育廳，設在廣州市惠愛西路附近一條橫街內。我們高師學校，則設在惠愛東路附近文明路小東門舊貢院內，兩地相距頗遠，步行約需四十分鐘。

我們看報紙知道：稚老到達廣州的訊息，大家都很高興，於是建議校長金曾澄先生，請他到學校演講。廣州是稚老舊遊之地，遠在光緒辛丑年，當他三十七歲的時候，曾經受兩廣總督陶模

之聘，就在張之洞所辦的廣雅書院舊址，籌辦「廣東大學堂。」第一次招考取錄的學生，有古應芬、楊永泰等一百人。汪精衛（兆銘）則是初試已考取了，而在覆試時被淘汰者之一。

前清末季，官場內幕非常腐敗黑暗，我們讀李寶嘉的「官場現形記」，劉鶚的「老殘遊記」和吳沃堯的「二十年目觀之怪現象」等這類寫實派的小說，就可知道其中的一些情況。稚暉先生這次到廣州，籌辦大學堂，第一次接觸到廣州的



吳稚暉（右）青年時代與夫人（右二）岳母（左二）及兩位公子合影。

高層官僚社會，略略知道他們卑鄙醜濁的內幕，不願多和他們來往，也不想當大學堂的「總辦」（地位等於現在省立或公立大學校長），做那腐敗王朝的準官僚，好像他的同鄉吳梅村在滿清初年被迫出山做了「國子祭酒」，落得一個臭名聲那麼的無聊。於是到了「廣東大學堂」第二年招生考試完畢，他就高飛遠走，帶同一批留學的親友，於一九〇二年繼續到日本求學。到了東京以後，爲着請求駐日公使蔡鈞用公文咨送江蘇、浙江、江西三省自費生九人入成城學校事，

觸怒了蔡鈞，受到驅逐出境的處分，稚老因此憤而投水自殺。但因遇救而不死，終於被迫回國，所乘的是法國郵船。當時蔡元培先生（號子民）剛好在日本，聽聞有這回事，恐怕這位姓吳的「血性老青年」在船上一時想不開，又實行跳入太平洋裏去，那就糟了。馬上趕到船公司買船票，護送稚老回到上海，那時中國人到日本是不用護照的，回國出國也沒有什麼出入境證。由上海到日本，比較從漢口坐船到南京還要方便。稚老於光緒二十八年壬寅五月，到達上海，住在拉拔橋北一間小餛飩店的樓上。聯同蔡元培、龍積之等組織愛國學社，並發行「蘇報」鼓吹種族革命。第二年，學社解散，稚老仍舊租住英租界內普通的民房，準備編書出版。接着就發生「蘇報案」，租界老巡捕房屢次傳訊稚老、和蔡子民、章太炎等，但因他們沒有收藏軍火及「造反」的實際行動，巡捕房即不予以拘留。同時上海道台已奉到兩江總督的指令說：

「照得逆犯蔡元培、吳敬恆，昌言革命，煽亂謀逆，着候補道俞明震、會同上海道密拿，即行審實正法。此令。」

但是，俞明震並不認真執行這道命令，只是暗中通知稚老，勸他趕快離開到外國留學去。先生於是摒擋一切，於癸卯年八月流亡到英國，暫住蘇格蘭愛丁堡。由於「蘇報案」發生於英租界，這個新聞，爲英國報紙所登載，當先生抵步時，英國人認他爲反抗滿清的「民族英雄」，把他高舉在頭頂上，以表示歡迎，使他受寵若驚。

先生從庚子年（一九〇〇）受義和團事件和八國聯軍的刺激，他的思想乃由保守而變爲激進，辛丑年赴日本留學，不久，就到廣州籌備大學堂，壬寅再去日本，旋回上海；癸卯年（一九〇三）到英國亡命，這時他已三十九歲，國父三十八歲，再過兩年乙巳，才有「同盟會」的組織。一九〇五年同盟會的組織，從歐美開始，然後在日本正式成立並擴大起來。就在這一年的春天，國父由巴黎到倫敦，和稚老第一次晤面，又介紹他拜訪康德黎老師，並在他家裏喫飯，彼此暢談數次甚爲歡洽。稚老對於國父深爲佩服，印象至佳。事後追述國父的品格和風度，稱譽他爲「自然偉大」，於是情願接受他的領導，於年底參加同盟會工作。他對國民革命貢獻很大，時賢也多所論列，我們看總統蔣公手撰的「吳敬恆先生百年誕辰頌詞」一文（五十二年三月廿五日寫的）便可知稚老一生從許多方面對國家民族及思想、文化、教育上的偉大貢獻了。此外，可參閱張文伯著「吳敬恆先生傳記」（五十

三年，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出版）。此處不能備述。

「不做官主義」的解釋

稚老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前旅居歐洲九年，大部份時間在英國，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底乘德國郵輪回到上海。民國成立，他抱定「不做官主義」，但對於國事，他則認為不能不過問。如不過問國事他以為等於神經麻木，不愛國，那是我國人的大弱點；但一問國事，又同做官連起來，却又是吾民的大謬點。他認為有人說「好人不做官，做官的都是壞人，都是官僚政客」，那也是錯誤的想法。要是做官的出於萬不得已，能喫苦受罪，為老百姓服務，而不為個人打算，這種官一定是好人纔能做得出來。他這種見解，非常嚴正，對於那些一輩子以升官發財為得計的官僚政客，真是當頭棒喝！

俗語說：「有人辭官不做，有人連夜趕場」，讀書人品流不齊，是很難說的。從前堯帝曾以天下讓給許由，許由不受，並且嫌堯帝這番話，弄髒了牛的耳朵；於是牽着他那條牛，到河邊洗耳朵去。稚老雖不一定像許由那麼高蹈，但是，他曾經放棄好幾次做大官的機會。民國元年國父在南京，請他做教育部總長；民十三年蔣公邀他做黃埔軍校總政治部主任；甚至據傳聞，某一次蔣公以國府主席徵求他的同意，他都一概堅辭不就。他所最感興趣的乃在於教育文化事業，特別是統一國音及國語運動。

稚老早年曾提議設「海外中國大學」於巴黎

。民十年秋為着籌辦「西南海外大學」，「里昂中法大學」及留法勤工儉學事，先生曾一再赴法國，並擔任中法大學校長；同時由我國推薦他為國際聯盟的文化合作委員會委員，由李石曾先生代表他出席會議。

自加入同盟會以後，對黨務相當熱心，自吹為「燒了灰亦是國民黨黨員。」從十三年改組後擔任中央監察委員，一直做到三十九年。在監委任期中，他和蔡子民、李石曾、張靜江等幾位委員於民十六年提出清除黨內共黨分子這個劃時代的大議案，由中央執委會討論通過，交國民政府執行。這個清黨事件，凡在青天白日旗幟下的中央及各省政府，都在嚴厲地執行，藉以鞏固本黨基礎，維護本黨政權，使容共時期三民主義受奸黨分子曲解的理論，得以澄清。稚老倡議清黨之功，實不可沒。筆者因協助地方清黨工作及辦理黨務學校的緣故，對於我所親受教益的稚暉老師，印象尤為深刻。

對人力車的態度

回憶民國十年年初，寒假將近結束，春天降臨大地，南中國唯一大埠也是革命策源地的廣州，正是春暖花開的時節，我們幾位廣東高師文史

部的學生，拿着學校的函件到廣東省教育委員會（陳獨秀的辦公處和宿舍）去邀請稚暉先生。那時他的身體很健康，精神飽滿，年齡將近六十歲，已是鼎鼎大名的黨元老和學術思想界的領袖了。但是如所週知他的生活很平民化：穿的是一套舊西裝，住的是普通職員宿舍，喫的是平常人

的飯糰。至於行呢，只是靠兩條腿。他從來不坐黃包車（廣州話叫做「車仔」），認為以人作牛馬，拉黃包車，太不合人道。有一次，一個朋友送他一副私家包車，他固辭不獲，於是自己動手，並叫他的學生今行政院長蔣經國先生幫忙，把那部包車，鋸斷了前面的兩條扶手，拿來放在書房裏，當靠背椅之用。他寧願安步當車，絕不坐這種不合人道的車子。那時候，廣州市還沒有計程汽車，公家和私家的汽車非常的少，三輪車還沒有發明，如今大眾化的公共大汽車在台灣的公路上到處奔馳，人們乘搭非常方便，但在當年只有上海、天津、香港等大城市有電車及無軌電車，不過，路線也祇有那幾條，一般人多以人力車即黃包車代步，車夫亦藉此種行業來謀生，不覺得有什麼不對。可是，稚老與眾不同，寧走路不坐黃包車，我們叫好車子在門口等候，他總是堅持不坐，只好陪他步行。那時候孫科（哲生）先生當廣州市長，正在拆城牆，脩馬路，路上的泥沙碎石子頗多，走起來不大方便。加上廣州天氣早熱，陽曆二三月已是初夏的溫度，在陽光普照下走幾十分鐘的路，我們都有點累了，但是稚老並不覺得什麼，還是春風滿面，邊走邊談。

講授注音熱忱感人

一到了文明路我們的高師大禮堂鐘樓下，金校長出來迎接，表示歡迎，略事寒暄之後，就開始走進大禮堂（這也就是三年後國父講演三民主義的地方）講解注音字母和國音統一運動經過，約定每星期講兩次，每次兩小時，（中間休息



吳稚暉（右二）與蔡元培（左二）張靜江（右）李石曾（左）合影。

十分鐘）就這樣一連講了四個星期，聽眾相當的踴躍，每次講完，聽講者都可發問，請稚老解答。他並且用許氏說文和康熙字典，當場注上注音符號給我們看，教我們照樣學做。由於廣州話保存許多古音，發音和腔調，和北方及中部（長江流域）各省，以及南方的桂林話，有很大的差別，俗諺說：「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廣東人說官話！」（廣州人說官話，或「普通話」，多接近桂林音，據我所親耳聽到的 國父、汪精衛、胡漢民先生等都如此）很多廣東同學，當時都不會說國語或普通話，（當年所謂國語，是以北方音為主，混合一些中部的音而造成的，並非如同後來教育部所規定的，以北平音為標準的國語。）很想用注音字母注廣州話，稚老於是又教給大家幾個廣州音特有的字母，讓那些只能說廣州話的同學拿來應用；大家都覺得有趣，也很方便。每次講完下課後，稍事休息，有些同學就請他寫篆書屏聯或單條或簽名在紀念冊上，他都當場揮毫，寫完了，我們照例步行送他回廣東教育委員會，我們心中都很感謝他一個月來的辛勞，完全盡義務來教導後學，並且也受他的精神所感動。當時我們的學校，連一部小轎車都沒有。我們的金會

澄校長從高第街到文明路辦公，每天坐的，也不過是一部自用的人力車，這在當時學生們的眼光中看來，已經是很高級的享受了。如今時代進步，淘汰了人力車和三輪車，正合於稚暉師提倡人道主義和科學技術的宗旨。他這一次和廣東政府接洽的結果，由各大縣撥出公款資助縣籍學生留法，我感同學也有被選上的，如現在台北的崔載陽教授便是。於是在這一年的夏秋之間，吳師便率領一批學生坐船到法國，入里昂中法大學讀書去了。

稚暉先生對於國音統一運動的貢獻，是有口皆碑的。現在台灣地區的一二年級國校學生，都學會了注音字母，讀注音的課文，到了三四年級，都能讀「國語日報」，說相當標準的國語，這是稚老首先提倡的功勞，其次要算是王照、盧翹章、汪怡、許壽裳和好多位音韻學家的貢獻。

被罵「王八旦」的幽默

據說民國初年，為着推行注音字母事，教育部在北平特別召開了一個大會，大家推稚老主席，當時創製字母的有幾位，王照先生字小航，也參加開會，他性情固執而暴躁，堅持要大家通過採用他所創的那套字母，但稚老認為不及現在所推行的，主張應用此種，王照大不高興，屢次力爭，看見通不過，就破口罵人，說出「王八旦」這類的粗鄙話。當時在座的人，都為稚老鳴不平，認為王照太無禮貌，非和他對罵不可。不料稚老仍然保持和藹的風度，很幽默地說：「好在我姓王！」在全場鼓掌聲中，王照悄然無語，離

席而去。現在我們用的注音符號，就是這樣通過後，由教育部頒行全國的。如果當時不是稚老善為說辭，幽他一默，那姓王的那能低頭離去？從



吳稚暉（前排左一）與林森（左二）宋藹齡（右二）于右任（右一）等合影。

這件事可以看出稚老善於以輕鬆幽默和寬宏大量來對人處世的方法，所謂「品格自然偉大」，可不是嗎？

泰戈爾遊華往事

說到稚老的幽默文章，真是笑梯滑稽，有很多令人笑破肚皮的妙句。記得民國十三年三月，我們在廣州忙於聽國父演講民族主義的時候，北方的學者詩人，自徐志摩以下都忙於歡迎泰戈爾和研讀他的作品。聽他的演講，幾乎好像着了迷一樣。但是，我們的稚老却給他們潑冷水，發表文章，婉勸「泰先生儘管吟詩，不管人的家國和天下事，詩人別有一種真正相對可允許的高尚。我們的陶潛先生他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就是一個模範。不要扯什麼東方西方做夢，害月亮裏的陳死人起來造空氣忙！」

但在另一場合，他却推重泰戈爾，他說：「蔡（元培）先生為什麼主張辦大學？彷彿是一個國家，只要有大學問家出來，民族就可以之而貴，一班人却可以之而尊。印度古代文明，我們姑且不說，現在他國家雖失了自由，因為有泰戈爾這個大人物，得到了諾貝爾獎金，很使人敬佩。平時我們看見一般印度人，似乎覺得這個民族不見得高明。但是回過來一想：如果真的高明，何能會出一個泰戈爾？這樣，也會想像到他們國家文明的程度。……我們現在要得到諾貝爾獎金的人物也還沒有。所

以蔡先生要盼望我們造就歷史上的大人物，（能够出一些有學問的大人物，使我國不至於空虛，也足以自尊、自責、自豪。）」

他從蔡先生說到泰戈爾，又說到諾貝爾獎金和國家的體面攸關。照我看來這些話正是莊言若諧，正言若反。因為他平日主張科學救國，多設立專科學校，造就工程人才；而不是要辦那些製造四方帽學士袍給人家學士頭銜的大學的。（他認為戴四方帽照相紀念，是一種傳統的虛榮心作祟！）在七七事變全面抗戰以後，稚老曾主張各大學一律停辦，教師們由政府安排，領導青年，從事戰時工作。但也有人批評說他這種主張破壞了學制呢。他又主張派遣留學生應以學科學及應用科學之工藝為限，至其他學科的留學生，則以自行籌措學費者為宜，此議亦不為政府所採納。

稚暉先生原是一個書生，屬於士大夫型一流人物；他留歐十餘年，深知道留學生的艱苦，他絕不看輕有真學問的留學生。不過，他特別重視科學工藝，好與那些有一技之長的工匠為伍，把車床、斧、鋸、刨、鑿，視為珍貴之物，比文房四寶還更重要。為着專心研究科技，曾經奉勸青年將線裝書暫時扔到毛廁裏去。在倫敦曾進過工藝夜校，學會了銅版和珂羅版印刷術。在六十歲那年，還加緊溫習法文和中學課程，準備考比國勞工大學。他以為當今的新教育，都趨重於「力役」，西洋社會科學工藝發達，整個環境是力役教育的環境，所以他們富強。中國，必須提倡「力役教育」的風氣，使教學做合一，學校和工廠農

場打成一片。學與工是不能分開的。學者當工，工者亦宜學。

為章士釗「發喪」

吳先生和後來投共的章士釗（秋桐），是早年很要好的朋友。民國十四年，章士釗做了段祺瑞內閣的教育部長，壓迫「新文化運動」與「白話文學運動」許多開倒車的行爲，稚老見其倒行逆施，不屑與之爲友。於是在北平出版的國語周刊第十二期，爲章士釗「發喪」，認爲他已經死了，表示不與他共存於天地間之意。但爲生友發出「訃聞」實在是一種惡作劇。其後章士釗投靠毛酋，到香港替毛拉攏一些文化敗類，做統戰的工具，章還作詩向毛獻媚，有「居然吾鄉成豐沛」之句。以肉麻當有趣，替兒皇帝捧場，真不知人間有羞恥事。如今章某也死了，他在陰間若遭逢稚老，必然被打幾個耳光，並且以杖叩其歷的。

民國四十二年十月三十日，一代完人吳稚暉先生，以八十九歲高齡，逝世於台北。當時筆者遠在南洋葡屬帝文島，擔任僑中校長及駐帝利領事館館務，以交通不便，遽聞噩耗，不及回台參加喪禮，僅寫了一副聯語，並致電弔唁，以示心喪之慟。據報章所報導，由政府所舉行的葬儀，事實上等於國葬，備極隆重與哀榮，一個窮措大的書生之死，耗費國家如許人力財力，在稚老固然受之無愧，但於心恐有未安，也說不定（？）治喪委員會遵照遺囑，將先生骨灰灰送至金門，

葬於南海。于右任院長在松山機場致詞：「願先生骨灰化為百千萬億的祖國精神，拯救百千萬億更苦難的同胞！」我想，這兩句話，當可代表先生的心願。

陋室大老準備殉國

回憶民國三十二年我在重慶服務，住環子嵐埡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內，距離先生上清寺寓所不遠，曾有機會偕同鄭彥察兄到他的寓所拜候起居，一間斗室，除書籬外，家具很少，床上的臥具，也很簡單，蚊帳很舊已經發黃，好像被火煙熏過的樣子。三十四年八月，抗戰勝利，大家都很高興，拜望先生的客人很多，他的「斗室」容納不下：於是他就坐在門口，與賀客及來往行人，互祝勝利，談笑風生，神情爽朗而自然，和青年人一般模樣，這時先生已八十一歲了。我們在背地，都稱他爲「吳老頭子」，的確他是配稱爲「天下之大老」的。

三十七年三四月，行憲國大代表集會於南京，先生當選主席，我是區域代表，敬陪末座。在會場中也有機會見面，以後就是「一別音容兩渺茫」了。

一直到民國四十九年，國民大會第三次會議，在台北開會，我由香港到台北，在敦化路瞻仰稚暉先生銅像，爲之肅然起敬，其後我到金門吳公亭瞻禮，也懷着同樣心情。想到四十年前從他學習注音字母的情形，念宇宙之悠悠，傷哲人之難再得，不覺愴然而淚下了！

稚暉先生於三十七年十一月大陸局勢開始逆轉的時候，已準備「殉國」是不打算離開上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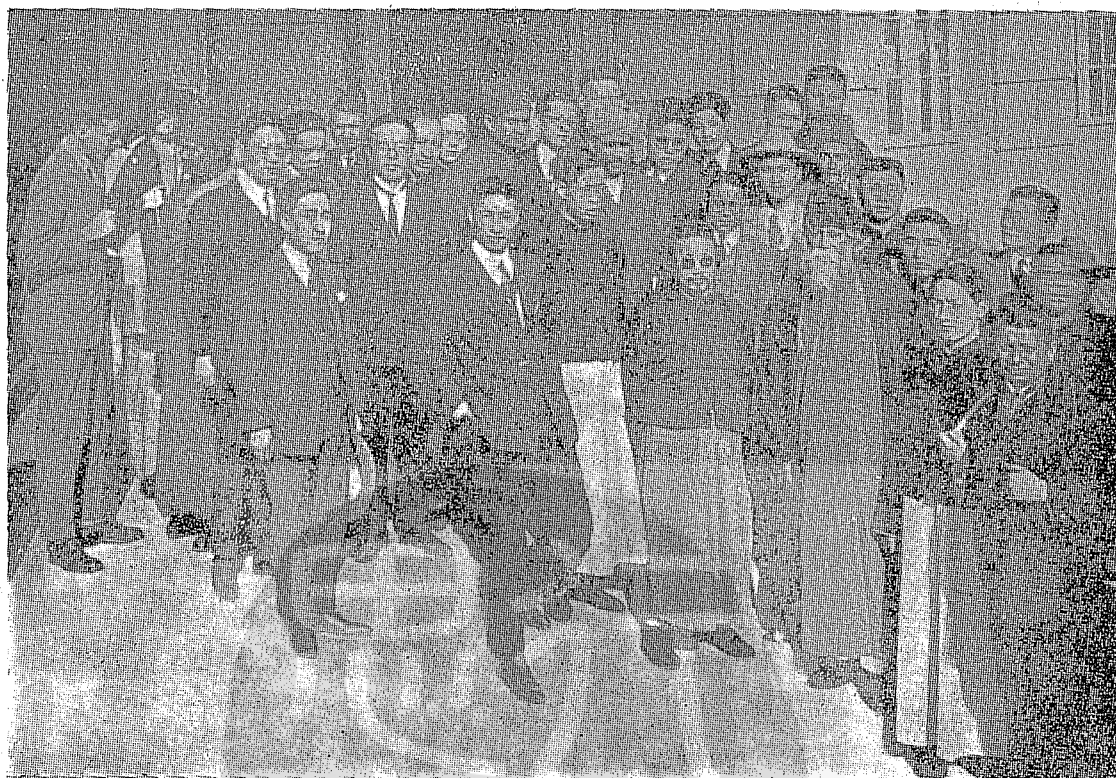
直到三十八年二月下旬，當局派專機迎接，勉強他飛來台灣避難，這時他已八十五歲了。吳夫人未及同來，在先生逝世之年，先半年病歿於上海。

「中飯主義」與「措大主義」

先生到台灣以後，由於時局及健康關係，心情漸不如前，似乎沒有從前那麼樂觀的懷抱了。這個，從他晚年寫給我的朋友黃文山（凌霜）兄的信可以得到證明。

去年秋天，黃文山兄自美國洛杉磯華美文化學院寄來「吳稚暉先生最後致黃文山的幾封信」影印本。打開來看，感覺到他老人家寫這些信時已八十七歲了，而對國事世事的觀察和爲華僑及大家的前途打算，仍非常詳盡。他提出所謂「中飯主義」勸大家到美國多開中國菜館。他說：

「研究什麼都是狗屁，留學也是狗屁……胡博淵開飯店、黃文山開飯店、吳稚暉也來開飯店，都帶子子孫孫開飯店始，子子孫孫都成爲高等科學家終……凡臭紳士要子孫永遠沉淪於官僚尾巴者，不要理他們，是反革命派，不是中飯主義。」他又說：「目前一代一代留學，一個一個回國，總是這樣，中國永遠落後！」文山兄



此，問訪華來（人三第起右排前）爾戈太斯納拉特賓萊人詩大度印春年三十國民
 吳，前空況盛，的樣迷了着像好，迎歡於忙都下以（二右）摩志徐自人詩和者學的方
 事下天和國家的人管莫，詩吟管儘生先泰」說的諧若言莊他，論評的妙巧很有却暉稚
 「。夢作方西東麼什扯要不，

以為稚老
 這個「中
 飯主義」
 是不會錯
 的。如今
 光是一個
 紐約城就
 有兩三千
 家華人餐
 館，即如
 曾做過大
 官的李伯
 豪（漢魂
 ），不是
 開起飯館
 來，全家
 子子孫孫
 都有博士
 學位麼？
 稚老的另
 一張是
 「措大主
 義」，他
 說「今日
 華僑開飯
 館、洗衣
 館，千辛
 萬苦，已
 打出華僑

今日在美的局面。……但是在美的「措大」說好聽點，就是「文人」；人數不下四五千；除學工程者較易謀生外，其他學文史、經濟、法律、哲學、心理學的，很難覺得相當職業，精神痛苦者，尤不在少數。何以反不若我不識文字的華僑祖先，能打出一個局面，寧非可怪？」於是他主張文人團結合作，開印刷所和書店，大量編印中國的故事小說，廉價傾銷，賺了錢，就多開書店。如上海棋盤街，成一措大局面，與「唐人街」或「中國城」並駕齊驅，同時還可安插甚多的措大，豈不美哉！這是先生最後理想設立「措大村」計劃。並且說他「還同 蔣先生說過，願意出數萬元（美金）資本，助此事之成功。」云云，可見他年已老邁，仍然對中國文人在苦難中如何找出路路的關懷。

親寫「告美僑胞書」

稚老於三十八年春到台灣後不久，適逢文山兄由台赴美，即交付一封親筆楷書的「告僑美同胞書」，托其帶去美國，內容歷陳俄國與中共在抗戰前後陰謀及大陸淪陷經過的大概。希望僑胞們担負起國民外交的使命，以復國運動自任，情詞非常懇切，他認為「秦庭之哭三日，我輩將非異人任也。……為天下萬世而哭師異域，不為辱也！」這封告僑胞書，曾於三十九年九月在台灣新生報連載過，於此見先生的愛國精神，老而彌篤，非常人所能及。此種精神，亦即 國父的民族主義意識和八年抗戰精神，一定和中華民族的生命延續下去，將無窮極，永垂不朽。